

法国对华 传教政策

(上卷)

[法] 卫青心 著

黄庆华 译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

(1842—1856)

上 卷

〔法〕 卫青心 著
黄庆华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

(1842—1856)

下 卷

〔法〕 卫青心 著
黄庆华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范明礼

责任校对:黎茗花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张汉林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FAGUO DUI HUA CHUANJIAO ZHENGCE

(上、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计算机室排版
河北省三河县潮河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6 印张 573 千字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04-1051-4/K·147 定价 14.00 元

序 言

今天的远东要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引人注目。然而，人们所重视的既不是“亚洲民众”的各种表现，也不是中国在当今时代人们所关心的事务中正在取得的地位，而是一系列巨大变化的起因。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中华帝国是如何被迫放弃“闭关”政策，为通商贸易打开方便之门，并且同意接受“西方”文明的呢？正是由于 19 世纪末叶西方在经济和精神方面的逐步渗透，20 世纪才有了清王朝的灭亡、中华民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的动荡及共产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等一系列变化。1842 年，当中华帝国的大门被“鸦片战争”的大炮攻破时，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就已经看出了他所签条约的意义。他曾经这样说过：“此约将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开辟一个新的纪元”。

勿庸讳言，尤其是近 20 几年来，史学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远东的觉醒方面来了。法国、英国和美国史学家都曾发表过大量的有关论著，不过，论著中的绝大部分是根据“西方的”原始资料撰述的，只有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在他那部论述“条约口岸之开放”的巨著中援引了大量的中文史料。欧美史学家的论著，多半偏重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卫青心先生这部著作可以说与众不同，最为突出的，是他的观点别具一格。《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一书的作者是中国天主教徒，他对传教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最使他感兴趣的，还是天主教差会所熟悉的、

1844年10月签订的《中法条约》中规定的传教自由。作者在撰写这部著作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中文资料,常把中国和法国两方面的资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应该说这是此书的长处之一。作者对法国特使拉萼泥同钦差大臣耆英的长时间谈判的每一个细节,如起草《黄埔条约》条款、双方如何分析和推断道光皇帝在给天主教传教士以传教自由的谕旨中会如何措词等,都逐一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为使读者充分了解中法双方代表在谈判的每个阶段呈送各自政府的报告的内容、比较同一次会谈的两种说法、分析谈判一方在力图识破对方的用意和想法方面的失误,卫青心先生可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我认为,只要读者能摆脱传统的观点,即“西方”外交家的观点,就不难理解清政府及其代表在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我之所以主张摆脱“西方”外交家的观点,是因为外交史研究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安全。

同样会使读者感兴趣的是,这部著作反映了一位把中华民族的忧患、反抗与自己的宗教信仰、天主教信仰结合在一起的史学家,在探讨一切与传教和教徒队伍的形成有关的问题方面的观点。清政府之所以不信任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是因为他们充当了外国在中国扩大影响的媒介,并且,这些人很可能成为导致中华帝国内部分化的起因。这就是中华帝国的忧虑所在。卫青心先生认为这种忧虑的产生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此外,作者在宗教问题上所做的一切阐述,几乎都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情。这种心情的产生,有时会使人感到奇怪,但却总是那么耐人寻味。这部著作也能发人深省,使读者的思维远远超出历史研究的范围,联想到当今世界天主教面临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这部著作是十年坚持不懈、潜心研究的成果;作者的态度

明朗，观点新颖。仅凭这些，此书就足以引起专家们的重视，同时，我也确信它一定会引起更广泛的反响。

皮埃尔·勒努万

绪 论

中法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近些年才建立起来的。早在中世纪十字军时代，蒙廷同教宗及法国国王，如腓力四世的使臣就开始了接触，只是这些关系有始无终而已。

在距今不远的一段历史时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将法国耶稣会部分学者作为国王的数学家派往北京朝廷供职。此事出现在康熙皇帝统治下的太平盛世。

这些伟大的传教士既是上帝的使臣，又是法国国王的非正式代表，同时也是欧洲自然科学的盗火者。他们远涉重洋，为使两大宗教流派——西方的基督教*和远东的儒教有幸相会做出了努力。

这种人文、科学和思想上的接触，早已被载入世界教会史册和文明史册。这种接触是在当时那个伟大时代的作家、哲学家及其他学者的启发下，在东西方的知识界得以实现的，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过积极作用。

由于这些杰出的耶稣会士的努力，加上他们的科学知识和高尚的思想境界，法国和中国相互间都得到了启示。两国在

* 本书“基督教”一词系天主教、正教、耶稣教（即新教）及其他一些较小教派之统称，并非专指耶稣教。——译者

道德准则的方方面面，认真探求接触点，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法国和中国共同努力的目的既不是商业贸易，也不是贪图物质利益，更不是为了在物质方面称雄，而是为了修行、科学和荣誉——这样一些无比珍贵的东西；为了天国的扩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尔伯*曾对最早到中国传教的五名法国耶稣会士中的首要人物洪若翰说：

神父，假如是为了自然科学，我们就不需要你们远涉重洋、背井离乡，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了。但是，为使那些非基督徒笃信我们的教义，使他们的灵魂归于耶稣基督，就必须请你们这些神职人员去做这样的旅行。希望你们珍惜这种机会，宣教之余，随时随地做些必要的考察和探索，使科学和艺术臻于完美。〔1〕

可以说，这些愿望在第一批传教士及其后继者的努力下，终于圆满地变成了现实，同时也使康熙年间的中国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彼此都受到了可喜的影响。

好事多磨。令人遗憾的是，所谓“中国礼仪”问题上偏偏又出现了长时期的激烈争论。接下来的就是，一方谴责传教士并将其逐出教会，另一方则迫害传教士并将其驱赶出境。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基督教失去忠实信徒达三分之一之多。1700年，中国教会有教徒30余万；1800年，教徒总人数下降到20万以下。〔2〕

因为精通汉学的耶稣会士在北京朝廷的庇护下，积极维护“中国礼仪”，所以，耶稣会被迅即取缔。这大概与这些耶稣会士同“中国礼仪”的反对派发生争执不无关系。说来也巧，耶

* 科尔伯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宠臣。——译者

稣会被取缔，恰恰又是在天朝帝国走向衰败时发生的。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正当北京朝廷宣布禁教、驱逐欧洲传教士的时候，教会在欧洲也受到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几次征战的严重冲击。

宣教的法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中断向外国派遣传教士的活动，何况当时的水陆交通已被英军封锁。日落西山的中华帝国对西方人的排斥，特别是对传教士的排斥日甚一日，中国传教事业前景暗淡……。法国同中国的直接接触，只是在王朝复辟时期，即七月王朝时代才得以恢复。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英国曾多次企图夺取法国在中国的地位，其中当然也包括法国在中国的传教地位。1842 年，英国通过商业贸易、外交活动，甚至大炮，迫使中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南京条约》，中华帝国被迫为外国通商贸易开放五处口岸。

路易-腓力普政府极力想削弱英国取得的利益，因此，他不愿把法国打入远东的日期拖得更久。于是，法国政府先是派一部分人前往打探，继而又派一支外交使团到中国表示友好，以期同中国建立关系。肩负这一重要使命的是拉萼泥，他不仅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

由于伟大世纪* 的法国耶稣会学者的勤奋和努力，法国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中国人对法国这个国家并不感到陌生。钦差大臣耆英在同法国第一任特使拉萼泥举行初次会谈时，曾经发表过这样一段礼节性的欢迎词：

* 法国人指 17 世纪。——译者

本人奉旨，转达皇帝对法国的友好情谊，并向你们致以(我认为是胜于对英、美及其他外国人的)敬意。

法国特使在答谢时说：

同样，我也是受我们尊敬的国王委派，前来表达法国对中国的友情。

法国同中国的第一个通商和好条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快缔结的。为能重操在中国传教的旧业，法国特使在同钦差大臣举行会晤时，还对那段光荣的传教历史作了简单的回顾，并且友好坦率地表述了法国关于在中国恢复传教的愿望，希望传教事业能在尊重帝国法律、风俗习惯和遵守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我如此简单地回顾过去，仅仅是为了向读者明确我研究这段历史的目的、方向和范围。我的写作计划很简单，只想依据各类档案资料，集中叙述历次政治和宗教事件，继而客观地探讨 19 世纪，特别是 1842 年到 1856 年这段时间的传教问题。

这段时间里，教难、纠纷，以及传教士与中国官吏之间的冲突和民教之争屡有发生。遗憾的是，不断发生类似矛盾斗争的原因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 and 解释。某些人在向公众讲起导致上述矛盾冲突的原因时，根本不尊重客观事实，以致不加思索地随意下结论。常有人谈论“教”难。难道抵制传教是造成这一系列斗争的唯一原因吗？中国人果真是福音传播和传教士活动的障碍吗？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引述教宗良十三世在 1883 年梵蒂冈档案开放时的一段讲话：

……要坚持以确凿的实据驳斥谎言和欺瞒，牢记历史法则，第一，不敢说假话；第二，不要害怕讲真话。此外，

历史学家不应该让人家对于你所做的褒贬产生怀疑。〔3〕

1884年良十三世在召见德国史学家时，曾经勉励他们说：

应该尽最大努力去获取第一手资料。我为你们公开梵蒂冈所藏档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我们不害怕实事求是，不害怕把这些文献资料公诸于众。〔4〕

我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努力做好这方面工作的。

我是天主教信徒，同时也是中国人，我很清楚自己对教会和自己祖国应尽的职责；我爱教会和自己的祖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10多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这方面历史的研究。我渴望自己的研究能有助于了解传教在中国的处境，有助于了解法国对华传教政策的制定和最终要达到的真正目的。谈到对教会和自己祖国的感情，以及我所从事的工作，我不禁想起了但丁的这样一句话：“是爱情驱使我，让我说话的”。〔5〕

除了传教，我还要谈谈法国政府外交代表和领事人员在中国这个具有上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帝国所肩负的繁重工作。因为中华帝国很清楚自己的光荣历史，所以，它对欧洲在向中国渗透和对中国施加影响方面所做的努力，很可能没有什么特殊兴趣，不过，它也绝不会因此而直接反对纯基督教教义的传播。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七个章节。

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是简单描述古老中华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介绍中华帝国对欧洲人，尤其是对基督徒所持态度的缘由，以及中华帝国的部分口岸对西方开放之前，天主教传行中国的情况。

第二部分内容的重点是第二、三章。我在这一部分中，扼要地叙述了英国商人走私鸦片的情形。鸦片战争期间，法国执行的是一条严守中立的政策，但是，这场战争对某些传教士的观点影响很大。此外，我也指出了中国最早同英国、美国、法国签订的、与传教利益有关的条约中的共同点。

第三部分的核心是第四、五、六章。这一部分中论述的仅仅是传教问题，因为传教是中法双方代表进行一系列谈判和争论的主题。双方的谈判往往分三个明显的阶段进行，而在这三个谈判阶段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僵持局面。不过，由于谈判双方都有良好的愿望，即便遇到重重困难，也能通过相互谅解加以克服。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双方议定一项临时协议，将协议书呈北京朝廷审批，最后给中国教徒以信教的自由。

第四部分，也是全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其大意主要集中体现在第七章中。我在这一部分中重点分析了法国特使为在华传教所做努力的意义和传教会内部的危机；详细叙述了传教士、法国外交代表和当时舆论界对这些棘手的传教问题的不同观点和看法。

在结语部分中，我概括性地论述了新形势的作用。如所周知，从1858年起，由于特殊情况的出现，天主教传教会开始置身于驻扎在中国的基督教列强的海上和军事力量的保护之下。这种状况差不多一直持续到不平等条约废除。这也是导致1900年残酷的义和团斗争的原因之一，这场斗争悲剧性地结束了一个漫长的动荡世纪。自从“传教”事务登上外交舞台，就开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对历次重大事件都产生过特殊影响。

我研究的问题，大部分是各传教会著名历史学家论述过

的。事实上，我不过是沿着前辈以卓越的研究成果为我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而已。在传教史研究方面，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江南传教史》的作者，耶稣会士高龙倍神甫。他从事传教研究，坚持不懈，长达数年之久；他撰书所参考的，全是上海耶稣会档案中的第一手资料。他的早亡中断了他的研究。当时这部论著还是石印本，后来，耶稣会士史式微神甫继续江南传教史的研究，并且录用了罗马和巴黎的部分有关资料。

耶稣会士亚历山大·布鲁神甫在传教史研究方面，也有许多颇有价值的著述，他的最后一部尚未发表的论著是《19世纪中国天主教会史》（暂用名）。在他生前，我对这部论著的手稿就有所了解；这位学者逝世后，在尊敬的耶稣会士雷蒂弗神甫的热情帮助下，我又一次参考了他这部遗著。这部论著充分反映了作者在论述中国的政治和宗教问题方面表现出的宽广思路和准确的判断力。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洛内神甫也对这方面作过大量研究。他编纂的（巴黎）《外方传教会通史》，主要是介绍巴黎外方传教会受罗马教廷之托，向中国各省派遣传教士的历史。此外，他还撰写过巴黎外方传教会人物传记。洛内神甫充分利用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原始资料。很遗憾，我无法接触有关这一传教会的档案，只好参考洛内神甫和一位名叫科斯廷的作家发表的部分资料。

我在论述遣使会问题时，所参考的主要是《遣使会回忆录：中国》和《北京传教史》两本书，其中《北京传教史》一书是作者以笔名托马发表的。除此之外，还有遣使会档案管理员、著名史学家孔巴吕齐埃先生破例为我提供的少部分有关资料。无法更多的掌握这一重要传教会的档案资料，实为憾事。

本书参考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巴黎 外交部档案馆分两部分收藏的外交史料，一是《回忆录及文件》；二是《政治通讯》。这两部分资料中有拉萼泥及其后任呈送法国政府的报告、法国代表和中国高级官员的往来照会，以及部分传教士的重要信函。

二、宗座代牧、传信部驻澳门和香港的帐房神甫、传教士及中国教徒直接呈送教宗和传信部枢机主教的大量报告，以及罗马教廷通谕等。收藏在罗马传信部档案中的这些手稿和官方文件，对研究接受传教的国家的教会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三、清廷外交史料中主要是道光和咸丰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收藏在清宫秘档中的这些重要文献，是在1929年被发现并影印出版的。其中有各省督抚、钦差大臣的奏折及皇帝和朝廷的谕旨。

这些文献资料清楚地反映了上个世纪北京政府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同时也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指责中国达官贵人在同外国使节交往中背信弃义、口是心非等不实之词。

本书基本上是参考巴黎、罗马、北京这三大原始资料（或者说是尚未公诸于世的史料）作成的。

四、拉萼泥的翻译加略利所作《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通过逐日地翻阅这部大事记，我对两国代表在争论有关传教问题时的各自内心打算和所采取的对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除此之外，我还参考了法国使团部分成员，如大古伯爵、伊地埃、好斯蛮、拉否例等人撰写的回忆录和文章，以及当时法国报界发表的有关新闻和评论。

五、发表传教士书信和报告的期刊：《传教年鉴》、《中国新

教区通讯》、《圣教杂志》等。这些期刊为我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

不管是论述什么问题，我从不忽视参考原始资料，而且尽可能做到论述有依据，引录有出处。其实，我只是想努力做“一个历史事件的普通报告者”。意大利伟大作家孟佐尼曾经说过：

历史完全可以给一场对时间进攻的辉煌战斗下定论；在从时间的手中夺回成了它的俘虏和僵尸的若干岁月的同时，历史可以使这些僵尸起死回生，对它们进行剖析，将它们重新编排起来……

因为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事件，所以，我必须努力再现历次事件中扮演各种角色的每一个历史人物，请他们开口讲话，介绍自己的情况，阐述自己的观点，谈出自己的道理。这些人既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又是本书的真正作者，因此，应该让他们以不同方式自我表白。

和世界各国及各不同时期的教会史一样，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也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事件构成的。尽管在华天主教传教事业的道路艰难曲折，甚至几经盛衰，但它毕竟是坚持走下来了。

本书没有叙及景教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先后在7世纪和中世纪中叶为传教所做的多方面努力，仅对伟大的传教先驱方济各（1552年在中国广州海岸附近的上川岛病逝）、耶稣会士利玛窦及其同伴，以及到中国传教的其他耶稣会士作了些简单的回忆。

在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和基督的使徒一样，在同

一种精神鼓舞下，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坚持不懈地为上帝的葡萄园做工，并以辛勤的劳动和各种牺牲，甚至流血的代价，使上帝的葡萄园藤叶茂密，硕果累累。

我非常崇敬这些令人仰慕的基督使徒，他们的名字只有上帝知道。唯独上帝能授予他们当之无愧的荣誉称号，给予他们受之无愧的报酬。尽管拙著很少提起他们，但是，他们开创的福音传教大业却是永世长存的。他们是中国天主教会、使徒教会和罗马教会的真正创始人和伟大的慈善家。

“他们的尸体被葬在极乐世界，他们的名字百世流芳”。^[6]

首先，我应该向我的导师，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巴黎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巴黎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皮埃尔·勒努万教授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自1943年起，勒努万先生就热心地指导我的学习。他不仅乐于主持我的论文答辩，而且还高兴地给我的这篇论文作序。拙著之所以能与读者见面，多蒙勒努万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赞助。谨此并志谢忱。

非常感谢教廷传信部秘书刚恒毅红衣主教阁下及其后任西吉斯蒙迪大主教阁下的热情支持，他们曾分别于1946年和1955年破例准许我查阅传信部档案。而且，在查阅这一部分档案时，蒙蒂科内主教阁下也曾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谨表谢意。感谢尊敬的神甫、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馆长热情为我提供有关耶稣会士在中国恢复传教的珍贵资料。

衷心感谢全权公使、巴黎外交部档案馆名誉馆长乌奥特雷先生和全权公使、巴黎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巴尤先生对我的大力支持。1947年、1956年和1958年，我曾得到他们的惠准，